

(新版)

邓小平改变中国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叶永烈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 叶永烈著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4

ISBN 978-7-210-03829-0

I . 邓 II . 叶 III .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I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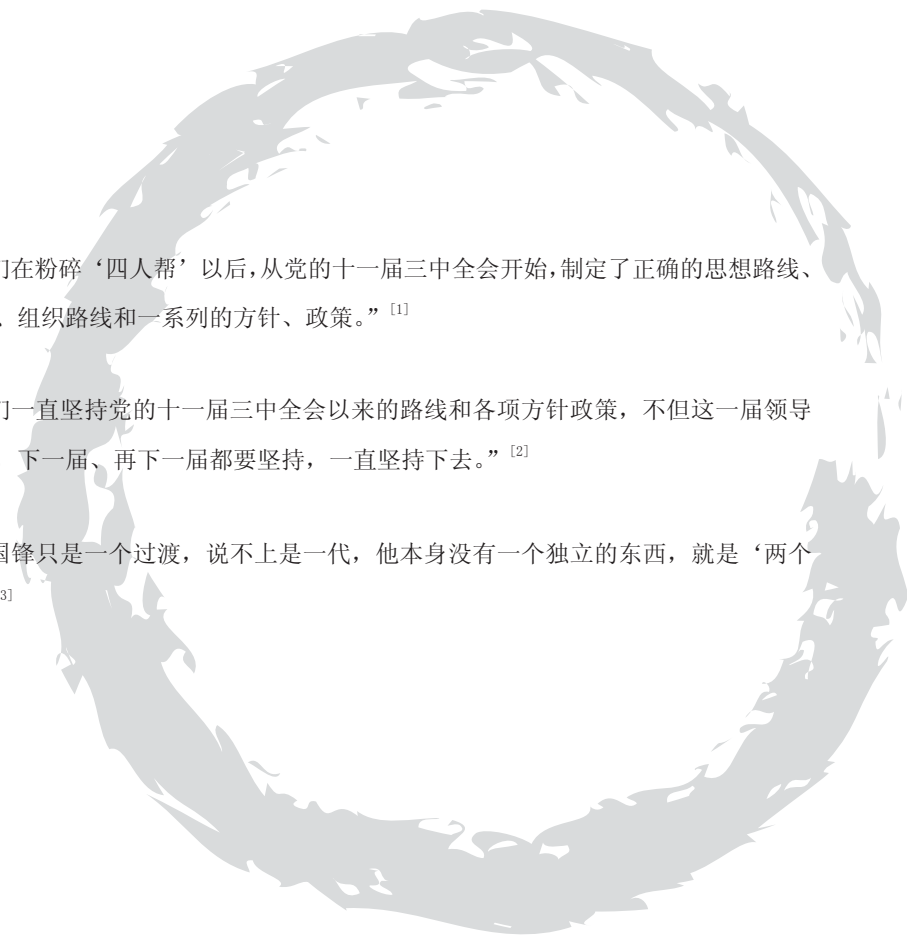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3222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书 名 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作 者 叶永烈
责任编辑 游道勤
特约编辑 程军川
美术编辑 兰 馨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330006)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北京九章图文设计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0-03829-0
定 价 49.80 元



“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1]

“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2]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3]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62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47页，《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8页，《组建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小 引

“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如今已经成了一句常挂在中国人嘴边的话。可是，这次只开了 5 天的会议，怎么会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怎么会成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呢？

中国人有句常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

这句话，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见；

这句话，在人们回顾往事时，总要这么说；

这句话，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语”……

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在中国知名度极高的会议，所以人们在讲话时，常常习惯于省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甚至省略为“三中全会以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准确，没有主词——“中共”，因为其他的党派也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于“三中全会以来”，当然更不准确，不仅没有主词，而且没有“届”——因为几乎每一届中央委员会都开过“三中全会”。

尽管人们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或者“三中全会以来”不准确，但是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人们还是这么说着——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太著名了，所以谁都明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至“三中全会以来”，指的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确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自从 1921 年 7 月在上海诞生以来，已经举行过 17 次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举产生的每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开了数十次中央全会。光是 1949 年 10 月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便已经召开了 25 次中共中央全会。

然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却是一次非同凡响的中共中央全会，其深远的意义超过了许多次中央全会，甚至超过了许多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此引人瞩目，是因为中国当代历史在这里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所谓“一个中心”，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所谓“两个基本点”，也就是“改革，开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 1957 年以来长达 21 年的“左”的严重错误。毛泽

东晚年的“左”的错误是从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的，到了十年“文革”达到了顶峰。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奉行“两个凡是”方针，仍继续着“左”的错误。直至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终于结束了这21年的“左”的迷误，把全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去。

正因为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转折性的巨大贡献。

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

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遵义会议的：

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

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于一个关键地位。^[2]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

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1]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正因为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了中共的历史转折点，中国的历史转折点。

正因为这样，“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成了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怎样的一次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怎样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怎样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本书以宏大的篇幅，第一次多角度、全方位、全过程向你细细记述这个“新时期的遵义会议”以及这个会议的前前后后，细细记述中国当代历史性的大转折，帮助你细细理解那句人人都说的“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深刻内涵……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1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一章 大转折前的急转弯

“毛的遗孀”被捕，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关于“毛的遗孀”如何被捕，向来众说纷纭。笔者采访了执行拘捕“毛的遗孀”任务的当事人张耀祠将军……

“毛的遗孀被捕”震惊世界

1976年10月12日清早，英国伦敦刚刚出版的《每日电讯报》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

这期编号为37752的《每日电讯报》头版头条地位，以三行通栏大字标题报道了来自中国的重大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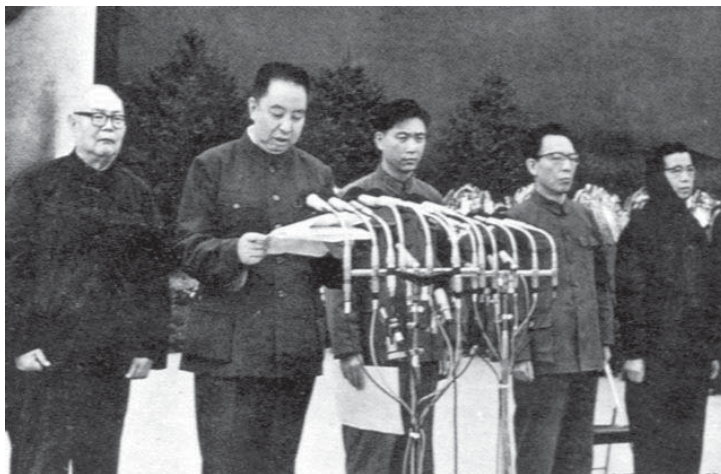
华粉碎极左分子（眉题）

毛的遗孀被捕（主题）

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副题）

报纸都很注重“抢”新闻，尤其是“抢”重大新闻。《每日电讯报》在全世界报纸面前，“抢”到了一个“第一”：独家披露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

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是在6天前——1976年10月6日晚上发生的。“毛的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百万人大会的主席台，左起：叶剑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

遗孀”——江青连同三个“极左分子”头目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就是毛泽东生前称之为“四人帮”的那“四个领导人”，在北京悄然被捕。

这一“粉碎极左分子”的重大行动，是在“华”领导之下进行的。“华”，亦即华国锋。华国锋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华粉碎极左分子”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便在“毛的遗孀”被捕之后，对外仍严格封锁消息。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独家新闻，出自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韦德之手。

韦德具有极强的“政治嗅觉”。自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世以来，他非常关注中国政局的变化。

早在20多天前，他便从中国电视的一个镜头中捕捉到重要信息……

那是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全中国都在收看北京重要的电视实况转播。用中国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当时的报道来说，“在辽阔的国土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举国上下，8亿人民沉痛悼念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国家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我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1]

新华社的报道用这样的语言形容毛泽东之逝：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无限崇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心中引起了无限悲痛。^[2]

几亿中国人收看追悼毛泽东的大会实况电视转播，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细节，然而，英国记者韦德却以他高度敏感的眼睛注意到了：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旁；当华国锋念悼词时，王洪文不安地探过头去，透过华国锋的肩膀，看华国锋手中的悼词稿子……

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华国锋的悼词充满“文革”味：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

[1] 《首都百万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隆重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人民日报》1976年9月19日。

[2] 《首都百万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隆重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人民日报》1976年9月19日。

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作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韦德高度敏感的耳朵也同时注意到：华国锋所念的悼词中，没有提到两天前，即9月16日，中国最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中反复强调的毛泽东“遗言”——“按既定方针办”。

韦德作出自己的判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政见分歧。

不过，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在当时的中国，韦德的活动深受限制。他设法向英国驻华大使馆里的中国雇员打听消息。

终于，在10月10日，韦德从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中国雇员那里获知重要信息：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标语，热烈欢呼两报一刊当天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韦德立即找来这篇社论，细细琢磨，发觉社论中有几句话很值得玩味：

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是谁在背叛毛泽东？是谁在篡改毛泽东指示？两报一刊的社论虽然没有点明，显然是有所指的。

两报一刊社论在当时的中国具有最权威的地位。韦德断定，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韦德使出浑身解数，很快就打听到：“毛的遗孀被捕”！两报一刊社论中所说的背叛毛泽东、篡改毛泽东指示的人，就是指“毛的遗孀”及其同伙。

于是，韦德在10月11日写出独家新闻《毛的遗孀被捕》，并立即发往伦敦《每日电讯报》。韦德写道：

据北京可靠消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江青和她在中国政治局的三名追随者被指控策划政变而被捕。这一逮捕行动是在周末特别会上向工厂和附近单位的政工人员宣布的。首都昨夜没有发现骚乱现象。

拘捕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内的所谓“上海帮”是1971年前国防部长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后，中国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闻。

翌日，当《每日电讯报》用头版头条位置登出韦德的报道，世界为之震惊！

10月13日，世界各报纷纷转载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消息，使这家报纸和韦德出了大风头……

关于“毛的遗孀被捕”的种种传闻

确实，“毛的遗孀被捕”，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那个历史性的夜晚成了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成为结束“十年浩劫”的句号。

从此，历史学家给中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写下这样的时间“界定”：“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始日期定为“1966年5月16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那一天通过了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

“毛的遗孀被捕”是在一个晚上突然爆发的，可以说是“历史的急转弯”。人们把中国粉碎“四人帮”称之为“中国的十月革命”。

对于这场“中国的十月革命”，人们只知道“革命”的结果——“四人帮”被捕，却并不知道这场“革命”是怎样发生和进行的。



1976年10月6日傍晚，江青在摘苹果（杜修贤摄）

中国当局对于“中国的十月革命”具体细节，守口如瓶，云遮雾障。在当时，这理所当然属于中国政界的“高度机密”。

正因为中国当局从不透露“中国的十月革命”的具体细节，于是也就给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记者和作家提供了充分的展示才能的机会。

首先对“中国的十月革命”绘声绘色，是在韦德发表那独家新闻之后，英国的《泰晤士报》眼看《每日电讯报》一炮走红，便在1976年10月14日，以头版头条发表法新社记者乔治·比昂尼克的报道《毛的遗孀正在伪造毛的遗嘱时被捕》。《泰晤士报》为比昂尼克的报道，加了这样的大字说明：

据北京的可靠消息，毛泽东的遗孀和30多名极左集团领导人在举行“阴谋会议”伪造毛主席遗嘱时被捕。

《泰晤士报》所刊登的比昂尼克的长达2000字的发自北京的消息，详细叙述了“毛的遗孀”被捕的经过。这报道理所当然引起“轰动效应”，比昂尼克一下子也出了大风头。

然而，比昂尼克那纯属编造的“新闻”，只不过是一堆耸人听闻的“谎言的泡沫”而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泡沫稍纵即逝。

其实，像比昂尼克那样的纯属编造的报道，有过许许多多。就连美国号称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罗斯·特里尔，在其1984年于纽约出版的《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直译应为《毛泽东夫人传》，中译本译为《江青正传》）一书中，也想当然地编造了拘捕江青的经过。虽说那时离“毛的遗孀被捕”已经整整8个年头，但是中国当局仍对那一事件保持沉默。

特里尔这样“透露”道：

一小时后，一队摩托车和一辆军用吉普静悄悄地驶过北京动物园附近空旷的街道，来到一圈灰墙上的一座高大的铁制大门前——这是官园。8341部队第37支队中挑选出来的一位校级军官和两位尉级军官跳出了吉普车，他们有行动指令。他们轻手轻脚地走进漆黑一片的官园，在经过认真研究地形图后，他们精确地知道哪个房间是他们突袭的目标。

他们足登轻便橡胶底鞋，像猫一样轻巧，摸到了大卧室的电灯开关，啪的一声打开了灯，一拥而入，冲进了硕大的卧室，自动步枪对准了卧榻。

江青像只老虎一样从被单中跳起，吃惊地睁大双眼，睡袍四下飘起。“不许动！”士兵们齐声大吼。刹那间，死一样的沉寂，似乎听到了阵阵回声。然后，江青瘫倒在地板上，大声悲号起来。压倒她那阵阵呜咽，校级军官粗声粗气地说：“你被捕了！”江青转过泪水模糊的脸喊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胆敢搞政变！”^[1]

其实，江青根本不是在北京官园被捕的，拘捕时也根本没有出动摩托车、军用吉普，更没有动用自动步枪。江青既没有“像只老虎一样从被单中跳起”，也没有“泪水模糊”。

在这方面，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也绝不亚于美国作家。

一位中国作家所著《1967年的78天——“二月逆流”纪实》一书，是在“中国的十月革命”之后整整十年——1986年出版的。在书的“开篇”中，作者这样惊心动魄地描述了“中国的十月革命”：

7日凌晨2时左右，天空一片漆黑，有十几辆军车驶出营区大门。赵营长荷枪坐在指挥车上，戴着耳机，无线电天线在挡风玻璃前摇曳。车队行驶十分钟后，已接近中南海……

车队驶近中南海北门，赵营长从枪套里抽出了沉甸甸的五九式手枪，暗暗想道，今天哪个龟儿子敢不老实，我就……他大拇指一推，下意识地打开了手枪保险。

“各分队注意！”他亮开嗓子发出命令。部队分成三个小分队，迅速奔向三个不同的目标——江青、张春桥住宅和怀仁堂。

各个小分队对不同的目标采取了同样的战术。1/3的兵力把守建筑物四周的路口，1/3的兵力包围建筑物，其余1/3的兵力执行逮捕。

这里不仅时间不对——不是1976年10月7日凌晨2时，而且根本没有出动“十几辆军车”。

作者这样“真切”记述在中南海张春桥住宅里拘捕张春桥的场面：

[1] 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313—31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张春桥还没有睡觉，在一盏宫廷式台灯下记日记。听到走廊上急促的脚步声，他仿佛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一把推开了圈椅，站起身来，板起面孔对着走进屋里的警卫战士们。

他眼睛燃烧着仇恨的光焰，紧紧抿着嘴一声不吭。他始终不肯交出保险柜钥匙，直到两名战士上前捉住他胳膊的时候，他还挣扎着威胁道：“你们不要太猖狂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会跟你们算账的！”张春桥没有显出过度的惊慌，他紧锁双眉，从衣架上拿起一件灰中山装，穿在身上。他穿得很慢，似乎很从容，他摸着新衣服上滑溜溜的扣子，费了老大劲儿才将它塞进很紧的扣眼里，然而，不知不觉他扣错了两个纽扣。他索性把纽扣全部解开，敞着怀，像个机器人似的，迈着僵直的步子，走出房门，在汽车里坐了下来，说得更确切一点，是瘫倒在座椅上。

其实，张春桥并不是在中南海住所被捕，所以这一切“细致入微”的描写也就子虚乌有了。

作者又如此这般描述了拘捕江青的情形：

与此同时，人数最多的一个小分队由赵营长率领，正在执行预料中最为艰难的任务——逮捕江青。江青住宅，赵营长来过不止一次两次，都是为公事而来。他常沿着摆满花草的宽大走廊，一直走到楼上的小会议厅，一板一眼地检查这里的保卫工作。这里的整个环境从没让他看见过有什么令人不安的、感到危险的东西。但是，这一次他却感到在走廊里有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气氛，连走廊也变得陌生起来了。江青的住处平时戒备森严，赵营长首先同江青的内卫周金铭取得了联系，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是！我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周金铭没有显出一点迟疑。这位奉命保护江青的内卫，是个忠于职守的军人，正义和良心促使他服从了更神圣的命令。

他下令撤去住宅里外的警卫之后，带领赵营长进入前厅，转身进内室去叫江青。

不一会，江青怒气冲冲地出来了，一照面就埋怨：“什么了不起的事，非要我起来不可？”

赵营长一字一句地向她宣读了中央的逮捕令。

江青听了，怔了一会儿，又换了一副面孔。她又哭又闹，倒在法国式沙发上赖着不走：“这是阴谋，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下毒手呀……”这个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二流演员，在扮演其人生的末场戏。然而，演戏也是需要观众，

需要剧场效果的。江青见对方（包括她的内卫）都冷冷地站着，无人买账，又自觉没趣了。她擦擦眼睛，站起来整整衣服，把手背到身后，昂起下巴说：“告诉他们，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江青固然是她的中南海住所被捕，但是前去拘捕的不是“赵营长”，江青也没有“又哭又闹”。

从法新社记者到美国作家，到中国作家，都如此这般细细编织了“历史的谎言”；当然也有客观的原因，那就是“毛的遗孀”究竟怎样被捕，中国政府一直未作正式的披露，于是，才会出现过这些绘声绘色的“传闻”。

张耀祠和汪东兴说出“拘江”内幕

任何的机密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解密。

虽说关于“毛的遗孀被捕”的内幕至今尚未正式公布，但是笔者以为，如今从零零散散、陆陆续续的信息中，已经能够勾画出那真实的一幕……

“毛的遗孀”江青，是由张耀祠将军在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半奉命前往中南海“201”拘捕的。

张耀祠将军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8341部队负责人。海外称8341部队为中国的“御林军”，因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党政机关是由8341部队负责保卫的。

笔者曾于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飞往中国西南，采访张耀祠将军。

据张耀祠告诉笔者，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1]

汪东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张耀祠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汪东兴是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物。其实，他的资历颇深，早在延安时期便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负责毛泽东的机要和安全保卫工作，中南海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汪东兴政治道路而言，有三次重要的升迁：

一是1965年11月10日，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鸿文”——姚文元的《评

[1] 关于拘捕江青的情况，主要依据张耀祠将军1992年10月9日、10日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也就在这一天，从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建立起就担任主任的杨尚昆，被撤销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接替了他。从此，汪东兴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达13年之久，直至1978年12月由姚依林接替了他。汪东兴在1977年曾说，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汪东兴此言，道出了他多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深知的中共高层内幕，尤其是“文革”内情。

二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汪东兴进入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核心圈。

三是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他的政治地位益发显得重要……

张耀祠来到汪东兴办公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也奉命到达。汪东兴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

然后，汪东兴向他们下达了在当天晚上拘捕江青以及毛远新的命令。



张耀祠（右）接受笔者采访，当年江青就是他实施拘捕的

张耀祠和武健华圆满地执行了汪东兴的命令，在当天晚上拘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以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张耀祠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8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对中南海了如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

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